

■新作聚焦

王清平长篇小说《流转》：

新时代的“土地情歌”

□陈义海

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但到目前为止还较少见到直接回应这一国家土地政策的文学作品,王清平的长篇小说《流转》或可被视为较好的文学实践。

让农民在土地上实现梦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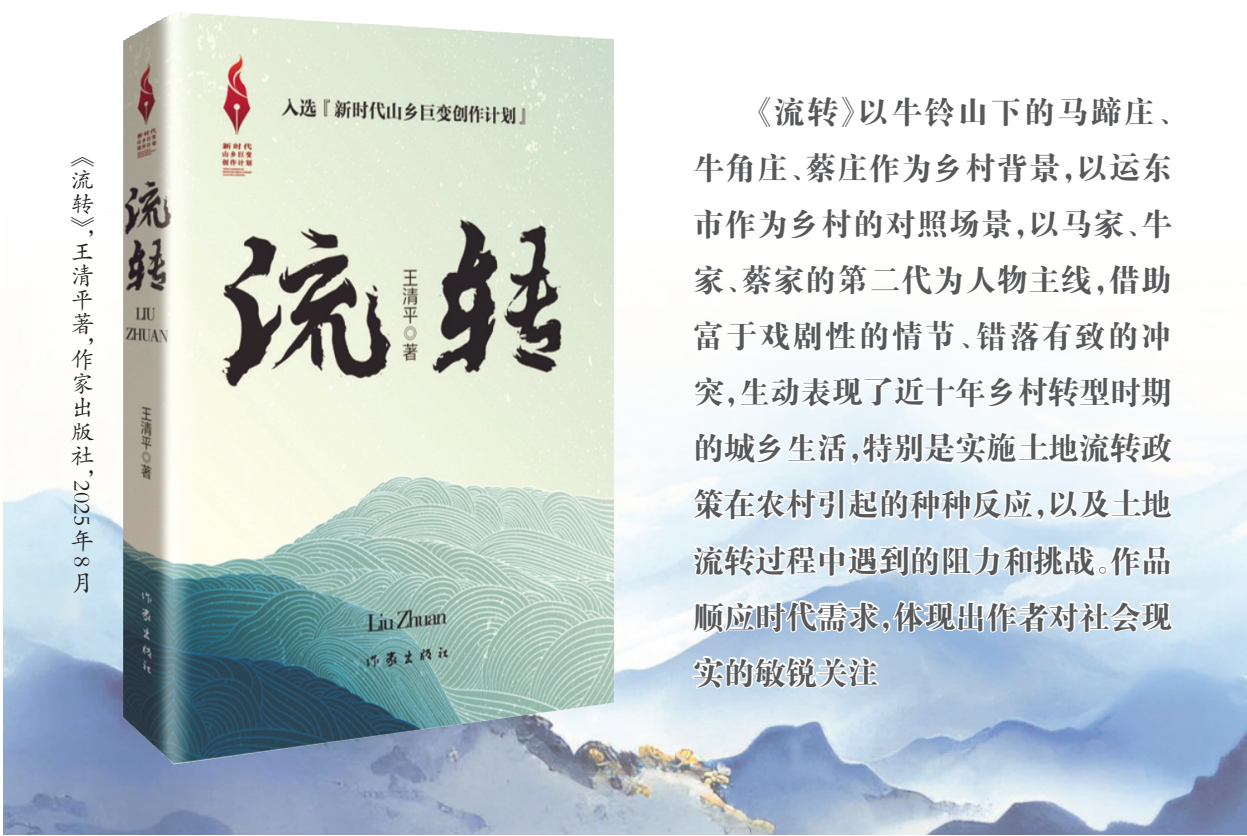
《流转》以牛铃山下的马蹄庄、牛角庄、蔡庄作为乡村背景,以运东市作为乡村的对照场景,以马家、牛家、蔡家的第二代为人物主线,借助富于戏剧性的情节、错落有致的冲突,生动表现了近十年乡村转型时期的城乡生活,特别是实施土地流转政策在农村引起的种种反应,以及土地流转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和挑战。作品顺应时代需求,体现出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敏锐关注。

为了更真实、更生动地书写土地流转这一主题,作者并未将故事的背景单一地置于乡村,而是同时将城市生活纳入表现的视野,从而突破了一般的乡村题材小说的场景局限。“城市—乡村”之间的往返切换,拓展了叙事的空间,丰富了叙事的维度,提升了叙事的张力。相应地,在表现土地流转这一重大题材的同时,作品还暗含了农民工这一副主题,并触及了改革开放近50年来几代农民的两难处境:“城里没家,却偏偏要在城里工作。乡下有家,却偏偏难得回家。城里有梦,乡下有家。”国家土地政策其实也暗含了这样的理念:让农民回归土地,并且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实现梦想,从根本上解决梦想与家园分离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王清平的《流转》触及的不仅是一个“点”,更是一个“面”。

《流转》通过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折射时代风尚与改革的壮阔波澜。作者将土地流转的“戏份”重点交给主人公马大成。这个来自牛铃山下马蹄庄的青年,集高考落榜生、城市打工仔、工程包工头、土地流转的先行者等身份于一身。他沉浮起伏的十年,也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十年。马大成作为主要人物,是作品的“中轴线”。他串联起城乡形形色色的人物:传统的农民、几代打工工人、官员、奸商……在马大成这一人物的塑造上,作家王清平大致采用的是拜伦塑造唐璜的方式,即让主人公有尽可能多的机会去经历和接触各种社会场景,通过他的“行动”展现社会结构中官、商、民的方方面面。王清平善于以“对照原则”塑造人物。开发商吴立仁、包工头曾家胜的阴险邪恶,让马大成正直的人格更显光辉;堂弟马大强的滑头滑脑,衬托出马大成的沉稳;妹妹牛艳丽的少不更事,使姐姐牛艳红这一形象更加丰满。值得注意的是,牛艳丽在《流转》中不算重要人物,甚至是一个让读者颇为不愉快的形象:沉迷于手机、寄生于网络、喜怒无常、没有担当。然而,作者对牛艳丽的塑造极其成功,她是一个最为“原生态”的人物形象,身上集聚了“Z世代”的诸多特征,正像司汤达认为当时的法国至少有20万个于连那样。《流转》还塑造了一批“中间派”“小人物”,正如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并不只是将剧情置于王宫生活,而是也通过平民社会表现历史,作家在表现土地流转主题时,通过众多性格各异의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展现出一幅真实、生动的时代画卷。

乡村的复调与泥土的气息

王清平善于设计悬念,并疏密有致地推动情节发展。《流转》以马大成因为高考落榜面临“踩代”、进城务工、成为包工头、与奸商周旋较量、回归故土、推动土地流转为情节线,将一个高考落榜青年的成长史与时代发展的主旋律巧妙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的“复调结构”。《流转》共分为十七章,前三分之一是铺垫,是矛盾积累,也



《流转》以牛铃山下的马蹄庄、牛角庄、蔡庄作为乡村背景,以运东市作为乡村的对照场景,以马家、牛家、蔡家的第二代为人物主线,借助富于戏剧性的情节、错落有致的冲突,生动表现了近十年乡村转型时期的城乡生活,特别是实施土地流转政策在农村引起的种种反应,以及土地流转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和挑战。作品顺应时代需求,体现出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敏锐关注

是“播种”悬念;此后各章,则是矛盾爆发、冲突加剧、悬念揭晓,全篇在情节发展上呈现出抽丝剥茧的效果。从小说的第七章《讨薪》开始,冲突设置越来越密集,尤其是马大成在第十章《流转疑云》、第十二章《唤醒梦魇》和第十七章《沸腾的牛铃山》中的三次流泪,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几次流泪,情景不同,在推动情节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前两次流泪,是因为姑妈以及姑妈家的蔡玉芹,是悲伤而泣,暗示世事凄苦;最后一次是他看到了土地流转的初步成效,是喜极而泣,体现出浮士德式的圆满。

《流转》的背景是苏北农村,确切地说,应该是作者长期生活和工作过的宿迁。他笔下的运东,指的应是宿迁市区;他落笔的乡村,当是他的老家泗洪;他所写到的清平湖,应该就是洪泽湖。可以说,《流转》也是一部反映农村题材的乡土小说。其乡土气息特别体现在酒文化上,以及叙事和人物语言上。首先,作为项王故里的宿迁是酒乡,浓郁的酒文化洋溢于整部《流转》。作者也善于借助酒来铺展情节。小说中,不管是写亲人团聚,还是商海风云,酒都是其间活跃的元素。“见酒走不动路。”“闺女是酒坛子,我有两个酒坛子,这辈子不缺酒喝!”“尿不到一个壶里,喝什么酒!”这些带着浓郁乡土气息的语言,把酒乡人对酒与人生的认识表现得淋漓尽致。其次,王清平在小说中使用了大量的民间俗语。这些俗语、谚语或歇后语中有些是泗洪一带特有的,包含了许多宿迁意象,比如藕、螃蟹、驴、磨等,体现了民间日常生活的智慧,也有很多表述是作家根据民间俗谚进行化用或活用,为作品烙上了鲜明的地方印记,这种“处境化”的(contextualized)语言,透出浓郁的乡土气息。

“踩代”与超越

王清平在《流转》中多次用到“踩代”这个词。这是一个农耕色彩很浓的方言词汇。笔者向多位方言学家求证但均无果,经过辗转了解才发现这个词只在泗洪的曹阳镇

一带用得比较多,指的是在贫苦的农耕年代,父辈都希望子女能出人头地,以后不用再种田。如果祖上是农民,子女未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而继续种田,那就是“踩代”。《流转》中的主人公马大成高考落榜,他的父亲马万里便觉得儿子“踩代”了,跳不出农门了。在得知儿子上不了大学的第一时间,马万里便决定回家盖一座石头楼房,意思是:儿子要跟祖先一样继续做农民了,要为他盖房子娶媳妇。不过,在马大成看来,如今,踩代不踩代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的概念。他到运东城里做了包工头,似乎是摆脱了踩代的宿命;可最终又从运东城里退出,回归牛铃山村,搞土地流转,做新型农民,似乎回到了踩代的老路。然而,新型农业与传统农耕已完全不同,全新的土地理念颠覆了千百年来旧观念,正如马大成对父亲所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我不想像你们那一代一样把儿子的胞衣丢在打工城市。我没踩代,我是在超越。”故事是小说的灵魂,语言是小说的血肉,处境化的语言是一部小说根植于其中的土壤。从“踩代”一词便可看出语言在《流转》中的叙事建构作用。

王清平的《流转》无论在主题设置、人物塑造、情节推动、叙事语言等方面,都达到了较好的水准。其生动的形象,错落有致的冲突,非常适合影视改编。王清平惯常写官场小说、商海小说,他的《干部家庭》《官场玩偶》《秘书天下》《守望官阶的女人们》《骗商》等作品都产生过一定影响,如今,他通过《流转》转向农村题材创作,这一“华丽转身”显示出其小说创作在题材上的宽度,更为时代奉献了一曲意蕴深厚的土地“情歌”。

(作者系江苏省中华诗学研究协会会长)

■短 评

时代变迁与森工发展的急流河

——读薛喜君长篇小说《沾别拉》

□金 钢

大沾河湿地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沾别拉”系满语,意为急流河,这条湍急的河流位于黑龙江省逊克县西部,滋养了两岸丰茂的自然生态系统。《沾别拉》从一个伐木工人家铺陈开来,以深沉的情感和冷峻的笔调,展现了近百年来四代森工人与森林、大河、动物的密切联系,以及森工人的爱与奉献。

《沾别拉》从抗战时期的东北森工写起,一直延续到当下的森工转型,使小说具有了历史的厚重感。自近代中东铁路修建以来,东北大小兴安岭的广袤森林便承受了过多的火灾、开发与建设。《沾别拉》开头的故事颇富传奇性。薛喜君塑造的老一辈伐木工人与北宋名将杨继业同名,这位伐木工人在表现出战将的勇武,斧劈妄图放火毁林的日本兵,而他的儿子杨石山、孙女杨春洛等也都成了林业人,共同承担起开发山林、守护山林的历史重任。

森林工业从伐木支援建设到停伐护林的转折,在杨石山的身上有着充分的展现。到杨石山任队长时,采伐队已从50多人发展到200多人,采伐工具也从过去的弯把手锯变成了油锯。但在采伐能力大幅度提高的同时,森工人却要面对育林速度远远跟不上采伐速度的困局。山河林业局辖区的老爷岭生长着红松、落叶松、冷杉等

珍贵树种,而这些树种生长速度极慢。杨石山退出采伐队,改去种树,正是预见到森林工业的这种困局,意识到山林已经受了重伤,到了必须全力医治、养护的时候了。

《沾别拉》流露出强烈的生态保护意识,在立足书写森工发展的同时,着力展现森工人与山林的复杂关系。杨石山是伐木能手,但他每次伐木前都在心里默念一首鄂伦春族的民歌,表达对有灵的大树的敬畏之情。薛喜君非常重视对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开掘,因为他认识到游牧、狩猎民族的人们与自然环境的联系更为紧密,他们更懂得敬畏生命,有节制地获取自然资源。《沾别拉》中的鄂伦春族老猎人早就为森工发展敲响了警钟,“山上的树越来越稀疏,空气也越来越差了”。这样发展下去,不仅是“鄂伦春猎人的路”会断,“黑瞎子”“傻袍子”等动物的路会断,森工发展的道路也会断。

在《沾别拉》描绘的森林中,人和树木、动物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杨石山的师父刘昌明躲过了“坐殿树”,却为了救徒弟,在“回头棒”下丢了性命。高守利、杨春洛夫妇孤寂的守塔生活,因红狐狸的到来而多了一些情趣,红狐狸充满了灵性,和守塔人共同谱写了和谐相处的生命乐章。在《沾别拉》叙写的一个个故事中,体现了万物平等的森林伦理,人不具有高于动物、

植物的存在意义,而是在索取自然、回馈自然、守护自然中实现了自身的价值。

《沾别拉》刻画了各具特色的森工人群体形象,大力颂扬几代森工人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林区的冬天人九以后温度低至零下三十八九摄氏度,而森工人面对的困难不只有严寒,还有各种各样的难题。《沾别拉》中有很多细节让人印象深刻,集材队靠牲畜跟不上采伐队的速度,就只能用肩扛,肩膀的皮薄,皮破了就只能磨骨头,因此被称为“磨骨头队”。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森工人仍然保持了乐观积极的工作态度。“撑起腰啊——哎嗨呦——”透亮的劳动号子在林间回荡,展现出集体劳动中的精神凝聚力与野性生命力。

相比热火朝天的集体劳动,森工人孤独的坚守更为不易。林业工作地点偏远,生活单调枯燥,与世隔绝感强。一代代林业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数十年如一日扎根深山,以林场为家,与树木为伴。营林、观测、防火、管护,都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杨春洛和高守利婚后不久,就有了去守“夫妻塔”的想法。在赡养老人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后,他俩就毅然决然地担起了驻守551瞭望塔的任务。“森工瞭望员是前沿的哨兵、森林的眼睛”,杨春洛25年如一日,多次观测到火情,使山火得到了有效的

控制。这种在平凡岗位上默默耕耘、甘于寂寞的执着与坚守值得肯定。

在《沾别拉》中,从杨继业到杨春洛的儿子高石头,四代森工人深知肩上担负的使命。“多出木材,出好木材,支援国家建设”;让山林“休养生息,再为子孙后代造福”,这些都是他们朴素而又坚定的信念。他们长年累月奋战在林区一线,舍小家顾大家,牺牲个人利益和健康,将宝贵的青春、汗水甚至生命献给了祖国的林业事业。杨石山倒在了他精心培育的红松林里,葛彤、曲黎敏为救采山的百姓被山洪卷走,肖旺才、王知顺、高守利在扑救山火的战役中窒息而死,他们既是普通的林业工人,更是与山林共生的民间英雄。

《沾别拉》记录了沾河森工从“破冰攻坚”到“破茧成蝶”的历史进程,在历史与自然的张力之间,既见证了工业文明对森林的索取,也预言了生态觉醒的必然,同时展现了森工人面对时代变迁时的无私与无畏。《沾别拉》的价值不仅在于保存这段行业发展的记忆,更在于为人与自然如何共处提供了文学维度的思考。在推动生态文学繁荣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沾别拉》为“美丽中国”注入了人文温度。

(作者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文学名刊
近作扫描

诗歌是积淀民族精神和传承文脉的重要载体。它不仅是个人情致的抒写,更承载着一个民族集体的记忆、情感与智慧。尽管文本形态与传播方式日新月异,但当代诗歌创作并未割断与传统文化的深刻联结。在近期的一些诗歌作品中,诗人们以现代的眼光与诗性的笔触,勾连古今,打量、挖掘、激活传统文化资源,使其在当代语境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以艺术的方式厚植文化底蕴,也为中华文明的传承提供了精神资源。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这是诗人、诗歌界关注的核心话题之一。2025年,多家诗刊开设专栏,以诗的方式重回历史现场,书写抗战精神。《星星·诗歌原创》第9期、《扬子江诗刊》第5期、《诗选刊》第10期分别设立了与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有关的栏目。这些栏目收录的作品共同构成了一部悲壮而辉煌的精神史诗。《扬子江诗刊》第5期发表的郭新民的《旗帜》诗句铿锵,充满了对历史的敬畏:“一面穿满弹洞的旗帜/一篇抗战胜利的红色经典/一件英雄血染的历史鉴证/读懂它昨天所向披靡的艰辛历程/就深谙今日弥足珍贵的时代价值”。《星星·诗歌原创》第9期刊发的林隐君的《浙东抗日根据地的英雄群像》则让英雄自己发声:“我不能选择生,但能选择向死而生”,“我不能回避死/但能选择美丽的祖国枕我于河山”。这些作品将个体生命融入家国河山的壮烈,正是抗战精神最动人心魄的体现,它穿越时空,依然能激起今日读者深沉的爱国情怀。

除了血与火的壮怀激烈,沉淀于历史深处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精神,同样在当代诗歌中找到了新的知音。士大夫的忧国忧民、耿介不屈与豁达超脱,成为诗人观照现实、安顿自身的精神资源。《诗刊》2025年第10期刊发的汤养宗的《苏东坡:惠州的萤火虫,天空上的月亮》巧妙地将苏轼人生的两种境遇并置:“庙堂之上,你是光华耀天的皓月/在惠州,却成了一枚山野的萤火虫/被换作明灭不定的东西/依然是你‘满肚子的不合时宜’/为忧愤夜空,你开启了一种晦暗的生活”。这种在逆境中依然保持精神独立与生命热忱的品格,正是苏轼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遗产。传统文化中开放包容的精神亦被书写。《绿风》2025年第5期刊发的邓汉平的《轮台长歌·绮梦千年》,回溯张骞西征、开辟丝绸之路的壮举:“伊犁河畔,战火连天纷争惊悸不安/历史的尘埃中,掩藏着未酬的壮志与悲壮的离歌/张骞西征越千山,西域风云幻梦间浮现/只为开辟丝绸之路,险阻不畏难,心间摇曳千秋业”。诗中“丝路之上,文化火花如繁星点点闪/交织在一起震撼着彼此心田与灵魂”,描绘的正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壮丽图景。

日常生活中沿袭的传统习俗与仪式,维系着社会的伦理秩序,也安顿着个体的精神归属。在快速发展的今天,诗歌成为记录、反思这些习俗的有效载体。有的诗歌记录着传统信仰与宇宙观。《诗潮》2025年第9期刊发南书堂的《问月》:“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古人今人不休追问/估计后人也是这样”。月亮作为一个古老的文化符号,是中国历代诗人寄托情思的共同意象,连接起古人与今人,体现了传统文化中天人感应、物我同一的哲学思想。这恒常的追问,指向的是人类对永恒、对未知的共同追寻。宗法制度与家族观念,则具体体现在村落与宗祠之中。《诗歌月刊》2025年第9期刊发的周葵的《活潭古村》描绘了一幅在时间中衰败又坚守的图景:“只有宗祠/替这座千年古村,保存着姓氏和余温”。宗祠不仅是实体建筑,更是家族血脉与文化记忆的守护神,是漂泊游子的精神之根。《星星·诗歌原创》2025年第10期刊发周吉林的《孔庙》:“历代朝圣的虔诚/就像雨滴/沿低垂九脊滑落/一个朝代的风雨/被蛀蚀的康熙题匾已经金漆斑驳/那一横一竖/挺立成华夏文明的脊骨”,诗句里孔庙象征的儒家文化与文明道统,在诗中获得了具象而坚韧的表达。

文化的创造与传承离不开人。那些看似平凡的手艺与人物,构成了传统文化坚实而富有温情的基底。诗人将目光投向这些风景,用文字为无名者立传,铭刻那些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手艺。《星星·诗歌原创》2025年第10期刊发的高仁斌的《一群会石刻的手艺人》表达了对朴素的无名匠人的歌颂:“这群会石刻的手艺人,没有留下名字/就像他们生活的朝代,没有留下反思”。诗人没有停留在对技艺本身的赞美,而是敏锐地捕捉到匠人与土地、与历史的血脉交融。同一期,高鹏程的《民间技艺(组诗)》展现了诗人对传统手艺的珍视。其中,《富阳草纸》写到,“正是有了这种物美价廉的草纸,才使世界变得更加干净。”草纸代表着最基础、最实用的物质文明成果,诗人通过对此暗示:真正改善人民生活的实用发明,比空谈道德的文章更有价值。在《金村窑场听青瓷烧制讲解》中,他描绘了传统技艺的核心,“最难的,依然是窑温的控制/1260度。这是梅子青渡化期/需要的烧制温度/然而如何掌握,完全取决于师傅眼神/审视窑火时瞬间的感知/这是泥与火的艺术”。这也是火与水之间的/秘密协议/只有最有经验的窑工才能掌握”,通过经验积累掌握的技艺是现代科技难以替代的人文温度。除了手艺,那些承载着民间记忆的平凡人物同样是诗歌关注的主题。《诗刊》2025年第9期刊发胡丘陵的《推鸡公车的胡良风》,“肩上,长满路边的荆棘/是一根不能折断的扁担/他推走一个又一个黄昏/将一家人颠簸的日子/推得稳稳当当”,诗人用具有画面感的语言,塑造了一个坚韧的劳动者形象。这不仅是个命运的写照,也是千千万万在历史长河中默默耕耘的普通人的缩影。这些人物、技艺让我们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温度。

纵观当下的诗歌现场,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文化并非陈列于博物馆的冰冷标本,而是活生生地流淌在当代诗人的笔端。诗人们以个性化的感受和现代性的表达,让民间手艺的温度、抗战精神的铁血、士人风骨的高洁、古老习俗的余温,在分行文字中重新苏醒。在技术理性日益凸显的今天,诗歌对传统文化的深情书写,无疑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它为我们这个时代提供了深沉的文化定力,也为漂泊的现代心灵找到了可以归依的精神家园。

(作者张虹云系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硕士生,蒋登科系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诗歌中的文脉延续与精神传承

□张虹云 蒋登科

《诗刊》《星星·诗歌原创》《诗选刊》《扬子江诗刊》《绿风》: